

# 试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的传播 ——以清末民初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谢建东

## 摘要

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传播肇源于清末西方列强入侵所引发的西南边疆危机,迫使清政府转变原有的国防观念,更加重视云南边防,在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作用下,清政府的现代国家边界意识越发清晰。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使命的推动下,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政府借助于新的印刷技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思想武器和学校教育的组织形式,试图同化边地少数民族、巩固边防。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边地酝酿、中心生成又反传边地,其在云南边地传播的过程,其实也是教育同化的过程。历史地看,这样的努力是成功的,但边地少数民族传统的“世界观”并未因此而完全消隐,依然具有生命力。

## 关键词

现代民族国家、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学校教育、观念传播

## 作者简介

谢建东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电邮:2008101536@ruc.edu.cn。

##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Nation-state Concept in the Yunnan Border Zones : A Study Centered on the Minority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XIE Jiandong

## Abstract

The spreading of modern nation-state concept in the Yunnan border zones originated from the southwest frontier crisi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caused by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powers, and the idea of national defense of Qing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change by the contexts. Hence, the government of Qing had to pay more attention on Yunnan border defense.

Thanks to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state concept, the modern boundary consciousness of Qing government became more clear. Being a modern nation state,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as one of the core appeal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tried to assimilate the minority in the Yunnan border zones and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frontier defense by new printing techniques, ideological weapo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nation state, and the school educational management. Meanwhile, the spreading process of the nation state concept,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border area, manipulated by the central, then back to the border, also was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ssimilation in this area. Historically, the process had been proved to be successful, but today the minorities' worldview in Yunnan border zones is not disappeared or assimilated at all; and to some extent, it's still vigorous.

### Keywords

modern nation-state, the Yunnan border zones, minority, school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of idea

### Author

Xie Jiandong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2008101536@ruc.edu.cn

在民族主义旗帜引领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只是，中华民族机体之内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观念是如何传播进而实践的？考诸历史，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生在边缘地带和西方国家所产生的摩擦、冲突紧密相关，至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则经历了先觉者到后觉者的传播过程，传播技术的进步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尽管边缘与中心、西方与中国等二分的视角，对于解释历史的复杂性和观念传播的弥散性是存在缺陷的，但也正是这样一个视角使笔者将目光投向云南边地。

正如王明珂所言：“在族群边缘，人们强烈地坚持一种认同，强烈地遗忘一种认同，这都是在族群核心所不易见到的。”（王明珂，2006:4）边缘也因此成为观察这一问题的最佳位置，而云南这个曾被清政府国防战略长期“遗忘”，直到19世纪末西南边疆危机才被重新“发现”的边缘，其边地作为边疆之“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如何传播的？

### 一、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说起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形象形式，它起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深刻变化。民族的想象成为可能，

需要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认识论的和社会结构的条件。认识论上的先决条件是指，中世纪以后，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包括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使得原先“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的旧世界观丧失霸权，继之而起的是“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观念，使得“民族”这个共同体的想象成为可能。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是指，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和报纸，为民族的被想象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在一套有机的叙述呈现结构中，民族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8）

也就是说，对安德森而言，民族这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由于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的半偶然的结合，相互作用、富有爆炸性，导致了拉丁文的没落，促使了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而以个别印刷方言为基础形成的世俗语言共同体，成为后来民族的原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9）

可是民族被想象出来之后是怎么传播的，毕竟，想象一个政治共同体虽然有着社会的合意，但最开始时不可能同时动员所有人参加。按照安德森的逻辑，民族主义以一种和资本主义发展类似的“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方式，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洲，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历史巨浪并相互激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11）中华民族的“想象”固然可以用认识论和社会结构的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语言的结合确实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但除了这样一个宏观的、全局性的视角，笔者更想追问的是，对于那些不识文字、不能阅读，没有印刷科技，更没有资本主义，地处云南边地且风俗迥异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的中华民族观念到底是怎样“想象”出来的呢？

杜赞奇认为，中国人对类似于“民族”的想象并不陌生，它先于西方现代民族主义传入之前就已存在。对中国而言，崭新的不是“民族”的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15）这一点，在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的实地考察中可以得到印证。跟据已故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的实地考察，“班洪境无野卡，多为卡刺，自称为腊家；以卡刺呼之，不悦，呼卡瓦，则若遭大辱者……余询之土人：何以讳言卡瓦？曰：卡刺与卡瓦，截然为两族，卡瓦鄙野，非人生活，不能以其名辱我族也”。（方国瑜，2008:5）可见，当时云南边地的少数民族并非没有民族观念，只是此民族与安德森所述之民族有差异。安德森所述之民族，比之中国，应与中华民族之概念相对，也正是边地少数民族群体需要“想象”的民族观

念。

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需要有传者、受者、渠道和内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的传播，其传播主体是政府和社会精英，尽管当时清政府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也有一个不清晰到清晰的过程，但其主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至于传播的受者当然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从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甚至缺乏中华民族认同的群体，被一步步纳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在与入侵的西方势力接触过程中的自觉，但更多的或许是被宣传教育与自我觉悟相互促进的结果。而要在云南边地完成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需要有一定的渠道、组织形式，辅之于一定的内容和技术手段。

根据尼尔·波斯曼的观点，学校是“技术统治文化的第一种世俗的管理机构”，是“管理信息生态的手段”。（尼尔·波斯曼，2007:37）它可以通过课程设置对信息源头进行组织、限制和区分，使一些信息流动合法化、另一些信息流动声誉扫地，进而缓解机器印刷书籍所带来的信息危机、控制信息流动，达到筛选、灌输、控制等目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使笔者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清末在云南边地兴起的现代学校教育——土民简易识字学塾。而清政府之所以对云南边地少数民族教育如此热心，是因为背后有着强烈的军事和国防目的。而这样的诉求，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息息相关。

## 二、边界意识、民族主义与清末国防观念的转变

云南边地民族学校教育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代国防观念的转变，然而不管是清末国防观念的转变还是边地民族学校教育的兴起，都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不过，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云南边地少数民族教育之间建立连接，中间还需要有一个因素或者一定的纽带，那就是清政府国防观念的转变。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农业经济结构，长期以来，西南地区的国防处于次要地位，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但随着缅甸、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地殖民化程度的加深，英法殖民势力侵入云南，一些地方被割占或被开为商埠，危机日趋严重，逼迫清政府不得不转变既有的国防观念，加强对西南边疆的关注。从表面上看，先是西南边疆危机导致清政府国防观念的转变，继而掀起了兴办边地民族学校教育的热潮，然其背后却是民族主义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思潮的强大推动力，而且国防观念的转变与边地民族学校教育的发展也是相互影响的。

与清末国防观念转变紧密关联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边界意识的进一步清晰。尽管

宋朝时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边界意识，但这种边界意识与欧洲近代兴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意义并不相同。（葛兆光，2004）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边界意识应该在清末民初才最后形成。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所执的一直是“天朝一藩属”的观念，朝贡体制之下的边界意识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意识不可同日而语。《南京条约》签订，明明是中国战败不得已而割地赔款，明明是有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却要冠以“大皇帝逾格施恩”等字样，一方面是为了自我掩饰，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清王朝作为非现代国家，其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的模糊。

不过，在与西方不断接触之后，到清朝末期，清政府当局，以及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与之相对应的国家边界意识。这一点可以从云南边地实际操办学校教育的官员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宣统年间，云南永顺普镇沿边学务总理李曰垓指出：

西南邻接交缅，历次堪界失地之多，方万余里。虽曰国力实弱，亦由我官民素不讲求边务。稍远之土司，即置诸度外，一切行政上、交际上之关系，若与我漠然无所涉者。外人则考查联络，无微不至，故樽俎相见，人则原原本本，如数家珍，而我则茫无把握，静听他人之指画…昔日之密支那，一荒原耳，今则屹然重镇。昔日之蛮暮坝，一沮洳场耳，今则良田万顷…吾边地之穷民，亦为所吸收，滔滔如水之就下，人民大去，此边庭莫大之危机。（李春龙，王珏，2007:614）

从李曰垓的例子可以合理推论，处在与西方摩擦最前沿的边缘地带的乡绅、官吏等群体，其关于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是萌发得比较早的，也是比较清晰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最先在边缘地带萌发并非偶然，因为它是在反抗西方列强侵略过程中不断形成与发展的，是屡屡被迫接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的结果，这些惨痛的教训和耻辱的经历经过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化反思、总结升华，再加上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等新观念输入的相互作用，变得越发清晰，再经由各种传播渠道使全社会也越发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

此外，边界意识、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想象与实践是交融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以民族的实体作为支撑，为民族的想象提供资源，在边界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有了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建立民族国家



不仅仅是近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整个民族所要完成的重大使命。对于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而言，其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将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推而广之、付诸实践，以求得主权独立、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20世纪初年，像梁启超那样的新式知识分子对“民族”“国民”等概念的界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和传播。（许小青，2006）根据梁启超的观点，民族主义有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之分，“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梁启超，1989:75）小民族主义是汉族对于国内其他民族而言的，大民族主义则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由于民族主义是近代世界各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最基础的思想动因，所以在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情况下，“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梁启超，1989:35）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不仅要破除满汉之间的畛域，还得打破之前蛮夷戎狄与汉民族之间的界限，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大联合。在此种思想的指引下，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地区亦为清政府和当时的有识之士所重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主权意识，即一个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处理对内对外事物的最高权利，这就涉及到边界意识。在民族主义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导下，在英法殖民势力入侵所引发的危机面前，清政府对云南边地的主权和边界意识不断增强，国防观念有了巨大转变。

边地国防的安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地民族、国民的人心向背，争取人心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把边地少数民族纳入“大民族主义”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必须使边地少数民族树立清晰的边界意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进而形成稳固的国民意识、国家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同与共识。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文化才是造成“华”“夷”分别的根本原因，（钱穆，1994：41）于是，边地少数民族教育被提上了日程。

### 三、“土民学塾”：固边与开化的新尝试

在经历了几轮冲突之后，清政府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西南边疆所面临的对手，已远非之前的少数民族部落或藩属国，殖民者有着先进的武器，政治、经济、文教等制度层面的先进性亦无可置疑。为应付时下的危机，必须转变国防观念，兴办教育是稳固人心的长久之计，考虑到当时的云南边地多是少数民族聚居，风俗迥异于中原，教化未开，若要使国防巩固必先开办民族教育，使边地少数民族知晓中原之

风俗教化，懂得必要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进而增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期于国防巩固的同时建成现代民族国家。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接受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的建议，正式在云南永昌、顺宁、普洱暨镇边直隶厅开办“土民简易识字学塾”，同时拨固定经费成立“永顺普镇沿边学务总局”，命李曰垓总理其事，具体负责“土民学塾”的创建及相关管理工作。“土民学塾”创建的目的、具体设置和组织教学的内容、经费来源等，无不蕴含有国防的因素，这说明，清政府试图通过对边地少数民族进行教育，以达到巩固国防的目的。

沈秉堃在奏折中说：“查滇边土目辖境，唯永昌、顺宁、普洱三府，暨镇边直隶厅紧接外域，今以兴学为安边计，自以从三府一厅办起。”（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2001：259）清楚地表明兴办“土民学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边防。这一点在沿边学务总理李曰垓的论述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他认为边地防营密布，但却军纪废弛，没有战斗力，与其花那么多的钱养“弊多利少”的边防军队，还不如酌情裁撤数营，用省下来的经费添办学堂。“以一兵之月饷养学生两名，已欣欣然有喜色，以一营之常款办学堂一所，更绰绰然有余裕。将来办理有效，学堂即有纪律之防营，学生即有节制之精兵，不惟使土民同化，又足以巩固国防。”（李春龙，王珏，2007：615）

另外，从“土民学塾”的设置及其组织教学的内容来看，也同样体现着清政府固边与开化的考量。当时“土民学塾”开办的永顺普镇沿边地区，具体指永昌府下属的龙陵、腾冲、畹町、潞西、龙川、莲山、梁河、盈江、镇康等县；顺宁府下属的云县、凤庆、耿马、双江、临沧等县；普洱府下属的思茅、景谷、墨江、勐海、景洪、勐腊等县；以及镇边直隶厅管辖的澜沧、孟连、沧源、西盟等地（地域包括今天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及保山市、普洱市和临沧市的靠边境县）。（马廷中，2007：204-205）“土民学塾”共128所，在三府一厅可谓遍地开花，招收学生3974名，包括傣族、景颇族、傈僳族、阿昌族、德昂族、佤族、回族、布朗族、缅甸人、南甸土人、芒市土人等26种民族及其支系。学生不通汉文的占十之四五，通汉语但不识汉字的十之二三，能初识汉字的只有十之一二。（云南教育委员会教育志办公室，1992：48）可以说“土民学塾”招收边地民族学生的目标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至于其学习的内容，因为“土民学塾”的创办主要是以同化边地少数民族为目的，“自应以国文为主科，先之以音读、讲解、习问，继之以抄写、默写，终之以

辍字成文。其辅助科目则以习礼、谈话、算术、体操、唱歌、农业六者为限。前三者改良其习惯语言、锻炼其心思脑力，后三者俾其服从规律、陶淑性情、增益智识。而尤在随时觉以尊亲之大义，作巩固国防之用”。（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2001：259）

再次，从“土民学塾”的经费来源，也可以看出清政府以开化分担固边任务的努力。据李曰垓的长子李生庄回忆，学塾“开办费为规银四万两，以后常年经费则是二万两，平均每所学塾可摊到开办费约312.5两，年经费约125.6两”（韩达，1998：963），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的。而且，“土民学塾”的费用不是由教育部门拨给，而是从边防经费中直接划出，也就是说“土民学塾”虽是教育机构，挂靠的却是国防系统，有着比内地普通学校教育更多的经费保障和职责要求。此外，由于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条件比较艰苦，学校教育还处于初创阶段，清政府为了留住教师，给的津贴比内地学校要高；学生上学不仅不收费、无偿供给学习用品，而且还有一定的补贴。

以上清政府关于“土民学塾”组织实施、地域划定、生源选取、课程设置、经费保障等措施，让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清政府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实践，有着固边与开化的双重诉求。政府借助于新的印刷技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思想武器，以及学校教育的形式、精心安排的课程内容，试图同化边地少数民族、巩固边防。新的技术手段、思想观念、组织形式有机结合，使云南边地少数民族教育呈现出与传统民族教育、内地教育不一样的图景，而当时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也因云南边地民族学校教育的推行，增添了某种微小却别致的现代景观。

清政府以教育巩固国防的直接动因是边地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朝廷体制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不同，以及所带来的观念和行为上的不同甚至是冲突。当中国被迫卷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后，不得不去适应一整套新的规则，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博弈，或者说反侵略的过程中，也自然习得了其规则和运转的逻辑，进而引起了国内一系列改革的连锁反应。巩固国防首先需要有明确的边界、清晰的边界意识，边界之内的人民、土地等是保护的对象，边界之外则是防卫的对象。总之，边界内外大有区别，思考的逻辑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和现代民族国家问题、边界问题扯在一起，那是因为土地是不动产，而人民是可以移动的，支配移动取向的是思想意识，教育对于人的思想意识有着极强的形塑作用。



#### 四、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与逆反：“学差”现象解读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开启了新的纪元、新的篇章，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也初步形成。有学者研究认为，新观念的形成主要是“戊戌维新以降改良派、立宪派和革命派思想和实践彼此互动的一种逻辑结果”，此外，“清末民初，中国人一般民族主义思想和情感资源的引发、调动”，“民族”“民族主义”“国民”“同胞”“中国人”“华人”“华侨”乃至“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共享概念的传播和广泛使用，也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黄兴涛，2002）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在新观念的影响下，“土民学塾”改名为“土民初等小学校”，并在学制、课程安排等方面进行了调整。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把“土民学校”一律改称“国民学校”，虽然只是在名称上变了一个字，但新的词汇、新的概念有着新的思想意蕴，从“土民”到“国民”的变化意味深长。

只是“土民学塾”的创办和推行，展现出了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上层精英的民族主义与下层民众的民族主义；非边地民族之民族主义与边地民族之民族主义。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很多元素来自下层、边地，进而传播到上层、内陆，或者由二者共同完成。但就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学校教育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往往是教育与改造的关系。比如，有学者区分了乡村与城市两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前者根植并传播于中国的农村，后者在与国外势力的接触中发展起来。像梁启超、孙中山一类的中国精英，总是设想在新的民族主义的逻辑下建立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以便将外国的威胁驱逐出去。只是，农民们并不认为那是多么急切的事，相对于民族国家的建立，拥有更多的土地，或为儿女寻求更好的婚姻更贴近他们的实际。（卜正民，施恩德，2008：139）

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所遭遇到的窘境与之类似，甚至更为糟糕，以致政府不得不采取强迫的手段来推进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学校教育。1931年4月颁布的《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第十二条规定，“边地人民之就学运动，应以劝导之方法为主，于不得已之时，始得参用强迫方式”，实际上为强迫教育建立了成文依据。（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948）到1935年6月的时候，时任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在《呈省府转请蒋委员长拨助边教经费文》中仍然强调：“本省边疆教育，应待实施，以期同化，而固边圉。”（刘光智，1993：212）

但因为固边与开化，或者说同化，更多的是政府单方面的愿望，加之当地少数

民族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把政府要求入学的行政命令看作是“当差”。为了应对政府的强力，完成摊派的上学名额，云南边地民族学校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中国教育史上较为少见的“学差”现象，即出钱雇人替自己的孩子上学，以完成上级分配的入学名额。

30年代初芒遮板行政委员（今芒市）报告“光复后创办土民学校，各处分派学生。一般人民都为夷俗所染，不愿就学，均系雇人代替”。同期盏达（今盈江县内）行政委员报告“夷人则以子弟有自愿向学者即逐出家，父子不相认之习。历年来办理教育只有汉人学子。员去岁到任，先行调查，强迫入学。富者雇人入校代读，贫者逃避国外。嗣见此情不增民智，反为扰民”。（韩达，1998：999）

“学差”现象也即“雇读制”之所以出现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教育管理、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因素。当然，“学差”现象也并非只在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地区存在。有研究者指出，民国时期四川西部藏族地区的雇读现象同样比较盛行。（李浩泉，2011）该文认为“‘雇读制’现象最早出现在清末，即清廷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兴办学校的过程中”。（李浩泉，2011）1903年和1907年，时任四川地方官赵尔丰曾两次奏请在川边地区“广兴教化”“兴学”，并把开办学校作为安定边务的重要措施。

从赵尔丰提出在川边地区兴办学校的时间来看，和云南边地办学的时间很接近，比云南略早，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把兴办学校作为固边和开化的基本手段，进而增强边地少数民族对政府、民族国家的认同，是当时政府和精英阶层的一个共识；二是从地缘上讲，云南处在跟西方殖民势力更前端的位置，但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地区开办学校比川西藏族地区略晚，似乎也可以佐证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激发固然最先在“边缘”地区，但它的形成却是在“中心”，特别是经过知识阶层总结升华、形成体系并对政府的施政举措产生影响，必须经过中枢才能完成，而这样的主义和观念要发挥作用，又必须返回到边缘地带的具体实践之中去。这一来一去，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过程，也就造成了原生观念和旅行之后的观念之间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学差”现象为什么会出现。

云南边地出现的“学差”现象，从源头上讲，是“大民族主义”理想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所遇到的阻抗，本质上是对强迫教育的一种反抗，是“不反之反”，政府当局的良苦用心与边地少数民族群众的认知和现实需求之间，没有实现很好的对接，一味地只是想改造、灌输的教育自然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也

具有必要性和历史的必然性。“良好的信息与新闻传播环境是民族地区各民族群众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郑保卫，2010:序一）不管是借助于书籍资料、课程内容的组织传播，还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等，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善、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谐共生，也是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这段时间里，现代学校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地方还不完善，边地少数民族群众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适应新生事物，学校教育的推行也需要一个不断尝试和调整的过程。总体来看，尽管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在初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但其因时而生，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的传播和巩固，对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和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善等，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五、结语

通过追索清末到民国前期云南边地民族学校教育的图景可以发现，近代云南边地民族学校教育的兴起，是西方列强入侵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之一；是在西南边疆危机的情况下，清政府试图以教育巩固国防的一种尝试；是力图把边地少数民族纳入“大民族主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准备。

至此，清末民初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传播的整个过程，已经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英法殖民势力侵入云南所引发的危机，使清政府认识到云南边地国防的重要性，在民族主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作用下，从清末到民国，以巩固边防和强化边地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为目的的边地民族学校教育被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土民简易识字学塾”应运而生，并逐渐为云南边地民族地区现代教育奠定基础。

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的传播过程，其实也是教育同化的过程，尽管它遵循的是由大民族到小民族、精英阶层到普罗大众的传播模式，是一种主动与被动、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但民族主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和流布，与最初发生在边缘地区的危机与因应密切相关，经历了一个在边缘酝酿、中心生成又反传边地的过程。当然，云南边地的危机只是其中之一，无数个从中国边缘地区持续涌来的危机，强化了国人被殖民和亡国灭种的恐惧，形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和实际努力，在这些努力当中，在边地民族地区兴办现代学校教育即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

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的传播的过程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主流思潮、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云南边地的既有秩序、既有文化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边界问题、国防问题、教育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被揉合在一起,国家的行政措施有时难免超越当地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由此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新的问题。但以印刷科技为代表的“技术世界观”、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和“传统世界观”在经历了紧张不安之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和谐,并共同生长。这一点,后来的历史进程做出了充分的证明。

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的组织形式固然促成了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和思想观念的巨变,但传统的世界观在裂变中传承,即便到教育和传播技术如此发达今天,也没有出现如波斯曼所说的那样,“技术垄断兴起之后,传统世界观随之消失”,文化最终向技术缴械投降。(尼尔·波斯曼,2007:28)云南的边地依然有少数不通汉语者,他们的生活传统虽然因为国家划界而受到了一些影响,但传统的“世界观”依旧存在,并且强大。现在,跨国婚姻、跨国经贸文化交流,国家口岸的设立,国门形象工程的建设,兴边富民行动的推进,定期开放的边民互市,边民通关便利化,以及其他一些针对边境地区的优惠政策等,正在以新的形式,超越传统的、技术的世界观,形塑着边地与内地新的共通的意义世界。

(责任编辑:陈辉)

### 引用文献 [References]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83年).
- [Anderson,B. (201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3).]
- 方国瑜(2008).《滇西边区考察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Fang, Guoyu(2008). *Western Yunnan border area investigation notes*.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葛兆光(2004).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1,5-12.
- [Ge, Zhaoguang(2004). The prominence of the “China” consciousness in the Song Dynasty: A distant source of nationalism ideology in modern times.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1,5-12.]
- 韩达(主编)(1998).《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二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 [Han ,Da(1998). *History of Chinese minority education (Second volume)*. Kunming: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黄兴涛(2002)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 1, 128-141.

[Huang, Xingtao(2002).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 Also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Chinese nation identity. *Zhejiang Social Science*, (1), 128-141. ]

李春龙、王珏(点校)(2007).《新纂云南通志(6)》.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Li, Chunlong & Wang, jue(2007). *New compilation of Yunnan annals (6)*.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李浩泉(2011).民国川西藏族教育“雇读制”现象述论,《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 86-91.

[Li, Haoquan(2011). A commentary on the phenomenon of “Hire to Schooling” in Tibetan education of western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6), 86-91. ]

刘光智(1993).《云南教育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Liu, Guangzhi(1993). *Yunnan education history brief*.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梁启超(1989).《饮冰室合集(2)》, 北京:中华书局.

[Liang, Qichao(1989). *Ice-drinking Room combined collected works (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马廷中(2007).《民国时期民族教育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Ma, Tingzhong(2007). *Ethnic education stud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尼尔·波斯曼(2007).《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2年).

[Postman, N.(2007).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

卜正民、施恩德(编)(2008).《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陈城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原著出版于2000年).

[Brook, B., Schmid, A.(2008). *Nation work: Asian elit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Trans.)*. Changchun: Jilin Press Group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0).]

钱穆(1994).《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Qian, Mu(1994).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introduction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王明珂(2006).《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Wang, Mingke(2006). *The edge of china: Historical memory & ethnic identit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许小青(2006).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社会科学研究》,6,141-146.

[Xu, Xiaoqing(2006). The rising of new history and nation state concep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141-146.]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2001).《续修四库全书(817).史部.政书类.皇朝续文献通考》.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Editorial Board of Continuation of Si Ku Quan Shu(2001). *Continuation of Si Ku Quan Shu(817). History department*. Political book category. Huangchao Xu Wenxian Tongkao.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云南省志(卷60).教育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Editorial Board of Yunnan Local Records (1995). *Yunnan province records (Volume 60)*. Education records.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云南教育委员会教育志办公室(1992).《云南民族教育发展概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Education Records Office of Yunnan Education Committee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 ethnic education*.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郑保卫 (2010).《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2009年刊).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Zheng, Baowei(2010). *Forum these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minority region (2009)*. Beijing: China Economy Daily Press.]